



Post-Olympism?
Questioning Spo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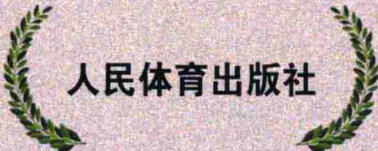
后奥林匹克主义？ ——21世纪体育批判

作者/[英]约翰·贝尔 [丹麦]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 等

译者/王润斌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科研资助项目

后奥林匹克主义？ ——21 世纪体育批判

作者 / [英]约翰·贝尔 [丹麦]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 等
译者 / 王润斌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奥林匹克主义? ——21 世纪体育批判 / (英) 贝尔等著;
王润斌译.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009-4889-6

I. ①后… II. ①贝… ②王… III. ①奥林匹克运动-文集
IV. ①G811.1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613 号

版权声明

书名: Post-Olympism? Questioning Spo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作者: John Bale and Mette Krogh Christensen

Copyright: :emoji: John Bale and Mette Krogh Christensen 2004

图字: 01—2015—355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集团授权出版。

*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787×1092 16 开本 15.75 印张 285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009-4889-6

定价: 50.00 元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8 号 (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 67151482 (发行部)

邮编: 100061

传真: 67151483

邮购: 67118491

网址: www.sportspublish.com

(购买本社图书, 如遇有缺损页可与邮购部联系)

致 谢

本书的内容最初发表于 2002 年 9 月在丹麦奥尔胡斯举行的一次名为“后奥林匹克主义？——21 世纪体育批判”的学术会议上，该会议由奥尔胡斯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在此，我们十分感谢组织者们的辛勤劳动，这其中包括简斯·奥利·简森、简斯·本兰德·克里斯滕森、托斯丁·汉森、奥利·胡瑞斯和乌拉·拉姆森。乌拉·拉姆森的秘书工作和组织才华再一次被证明是无可挑剔的。

还要感谢对资助了本次会议的奥尔胡斯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理学院，丹麦体育联合会以及丹麦文化部。如果没有上述组织的帮助，就不可能促成这次跨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撰写这些章节的作者们，他们提供了上乘质量的文本，乃至无需花太多时间进行编辑处理。最后，要感谢博格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是凯瑟恩·俄勒、安妮·霍布斯、珍妮·豪厄尔和菲丽丝蒂·豪利特。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才使得这一组会议论文最终实现为一个连贯的文本。

约翰·贝尔
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

中文版序言

王润斌博士是我院近年来引进的优秀青年教师，他在奥林匹克研究领域里已经浸润、积累了十年工夫，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民族主义演进与奥林匹克发展》在学界引起了积极反响，他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等相关课题，在《体育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高质量文章。作为他的同事，也作为关注过奥林匹克研究的学人，我十分欣喜地看到这本译著问世，并非常乐意地受润斌博士之托为本书作序。

《后奥林匹克主义？——21 世纪体育批判》一书以后现代主义“解构”的逻辑手法审视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体系，以批判哲学的范式认识 20 世纪国际体育领域内的文化冲突与矛盾，为 21 世纪体育的发展走向提出新的思路与方略。该书较为系统地提出“后奥林匹克主义”这一学术概念，在奥林匹克学界还是第一次，且一经提出就瞬即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研究界的热门话题；而其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形式则成为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多元文化阐释的典范。如该书主编约翰·贝尔与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指出的：“在解释奥运会的不同路径中，这些跨学科的作者从没有将他们的立场和角度根植于特定的、单一的哲学之桅上。部分内容原则上支持奥林匹克理想但都采取更宽广的批判视野，他们的批评来自不同学科、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源头。”此外，该书透露出的本土文化立场也能为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奥林匹克研究话语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润斌博士选择翻译这本学术味道浓厚、语言表达专业、作者背景多元的作品，表现了他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尽管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走了不少弯路，但他都能咬牙坚持，实属不易。从他扎实的工作中也看到了当年我研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高等教育发展等议题时的艰辛与纠结，尽管在语言的本土化、表述的贴切化方面，该书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我还是要祝贺他在引介西方奥林匹克经典学术作品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最后，衷心祝愿读者们能够在阅读本书时有所收获，祝愿润斌博士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

方千华（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作者简介

约翰·贝尔：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与英国基尔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曾在芬兰的于韦斯屈莱大学、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他最新的书是《想象的奥林匹克选手》（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2）、《奔跑的文化》（弗兰克·卡斯出版社，2004）。他还与迈克·克罗宁编辑了《体育和后殖民主义》（博格出版社，2003）。

道格拉斯·布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授，讲授体育历史课程。撰写过《种族游戏：南非的体育与政治》（1998）、《澳大利亚的海滩文化：太阳、沙滩和冲浪的历史》（2001）。目前正在关注体育的历史知识与方法。

道格拉斯·布朗：卡尔加里大学运动学系助理教授。擅长从历史和人种学角度研究体育。试图将研究者和学生的角色重新定位于亲历的体育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作者曾经从美学角度对顾拜旦为现代体育和奥运会所做出的创举进行了研究。还研究过加拿大落基山脉地区的登山文化。

苏珊·布朗内尔：圣路易斯的密苏里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曾是美国国家级的运动员，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赢得1986年中国大学生运动会女子七项全能的金牌。在《为祖国而训练：中国道德秩序框架中的体育》（1995）一书中讲述了自己中国留学的经历。

本·卡林顿：在英格兰布莱顿大学教授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课程。曾与伊恩·麦当劳主编过《种族、体育和英国社会》（泰勒和弗兰西斯，2001）。

理查德·凯仕曼：新南威尔士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该校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澳大利亚体育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是澳大利亚和亚洲体育的历史，包括殖民化和非殖民化，奥运会和大型活动。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籍包括《民族想象中的体育：在澳大利亚联邦体育二十年》（2002）、与安东尼·休斯合编的《奥运会：事件及其影响》（1999）。

米特·克劳奇·克里斯滕森：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她的研究兴趣在于体育教师和体育参与者的生活史以及体育教育方面。出版了数本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索伦·达玛加尔：哥本哈根大学文化社会学与体育科学专业的副教授。先后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索邦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他是哥本哈根大学文化社会学与体育科学专业的副教授。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普通社会学、社会学和身体哲学、审美哲学、身体理论与舞蹈理论。

亨宁·埃克伯格：是一位文化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丹麦盖莱乌的体育、文化与公民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职务。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和身体的文化社会学、文化和体育运动；运动文化生态学；近代军事技术史；印尼研究和民主、少数民族和国家认同研究。

约翰·霍伯曼：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日耳曼语系教授，撰写了多本与体育有关的书，包括《体育和政治意识形态》（1984）、《致命的发动机》（1992）和《达尔文的运动员》（1997）。曾在欧登塞的南丹麦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

昂德·克鲁吉尔：是一名体育科学教授，在哥廷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体育与社会系担任系主任职务。参与编写了二十本书。曾先后三次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近期的著作包括与威廉·穆雷合编的《纳粹奥运会》（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3）。曾经参加过奥运会，还担任过欧洲体育史学会主席一职。

海伦·杰佛逊·伦斯基：安大略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自 1980 年以来，作为一个体育社会学家，致力于性别问题研究；1992 年以后，将研究转向为奥林匹克产业批判。最近的两本专著是《透视奥运产业：权力、政治、激进主义》（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和《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社会影响》（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

西格蒙德·罗兰：奥斯陆挪威体育大学体育哲学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体育伦理学，体育和运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体育和生态，体育思想史。最新的书是《体育中的公平——一种道德规范系统》（洛特里奇出版社，2002）。

瓦尔纳·莫勒尔：南丹麦大学健康科学学院体育科学与临床生物力学系副教授。他编著了一些体育、兴奋剂与健康方面的书籍。与约翰·劳莱特共同编写了《体育的本质》（2003）。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身体文化、卫生、药品和竞技体育。

辛西娅·辛德尔：伊利诺伊大学与约翰·亨利·纽曼天主教思想研究所的副教授，从事体育批评和解释理论，文化学和解释学等领域的研究。是一位享受国家津贴的人文科学研究员，担任《体育史杂志》的评论编辑以及《体育运动与社会问题杂志》的助理编辑。

阿兰·汤林森：英国布莱顿大学从事体育与休闲研究的教授，担任该校“体育与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的组长，并负责切尔西学院的研究中心。作者还在肯特大学研究人文社会学，在瑟赛克斯大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写了许多文章，撰写或主编了三十多本书，领域包括：体育的社会历史和体育社会学，流行文化，休闲消费等。

凯文·沃姆斯雷：西安大略大学体育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国际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专门研究加拿大体育史与奥运会，特别是政治和性别方面。他还是《奥林匹卡：国际奥林匹克研究杂志》的联合主编。

译者简介

王润斌：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担任副教授与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主要承担体育管理学方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奥林匹克运动、体育历史与文化。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课题 5 项，出版专著 2 部，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论文被学术会议收录 10 余篇，获省高校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1 项。代表性成果有《民族主义演进与奥林匹克发展》《奥林匹克主义的历史哲学审视》《现代奥林匹克理论的缺陷与中国体育文化的补位》等。目前在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合作导师黄汉升教授从事体育学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建构等领域的研究。

英文版导论

这本书是通过关注体育的神坛——奥运会——来批判 21 世纪体育的本质与未来。奥运会已经成为体育运动的集大成者，而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寻求超越奥林匹克主义，因此书名为《后奥林匹克主义？》（请注意问号的存在）。我们是在字面和比喻的两层含义上采用后奥林匹克主义一词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是寻求未来，另一些章节是追溯历史性的奥运事件，其目的是为了评估它们的后奥运特性，或是为了探寻这些运动会对当地产生了哪些影响。此外，一些章节是针对已有奥运会的传统描写和研究基础上的重新评价。

与现代奥运会有关的研究著述已经十分丰富了，对奥运会的阐释与解读可谓跨越了——从统计数据到冠军生平、从刻板的历史到感动的故事、从当前评论到新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的漫长时空。体育的全球通用语言特性，体育对人类友谊的锤炼都促使奥运会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体育事件。奥运会被解释成现代意义上的“面包圈与运动场”，选手和观众都被蔓延的商业化所愚弄（布罗姆，1978）。在解释奥运会的不同路径中，这些跨学科的作者从没有将他们的立场和角度根植于特定的、单一的哲学之桅上。本书部分章节在坚持奥林匹克理想的原则上又都采取更加宽广的批判视野，他们的批评来自不同学科、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章节都能够唤起我们在奥运会进入第三个世纪时的思考。作为一本称作后奥运的书，我们感觉到应该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最近 10 年间，作为前缀的“后”，被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的研究者所运用，但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语。本书的作者们在各自的章节里对“后”的理解各不相同。

第一种采用地理学家迈克尔·迪尔对后现代主义的分类，后奥林匹克主义首先被理解为一个时期，一个特定的阶段。例如：后奥林匹克主义可以被运用在 19 世纪末奥运会复兴后的困难时期，被理解成一种颠覆传统方式的例证。它也可以用来形容未来奥运会的身体文化实践将要过时的时期。此外，还可以被理解成为每届奥运会后遗产被开发和评估的时期。另外，还可以被理解成顾拜旦倡导的奥林匹克主义理想因腐败、剥削或忽略而变迁的时期。

第二种，后奥林匹克主义被解释成为一种类型或风格范式。近期的奥运会同 20 世纪早期的奥运会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吗？它们更加具有可以预测性、更加标准化、更加媚俗吗？或许是这样的，自从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开始，奥运会开始受到各自意识形态的驱使，逐渐偏离奥林匹克主义创始人威廉·彭尼·布鲁克斯、皮埃尔·顾拜旦设计的道路。最近的奥运会变得充满世俗化和铜臭气，庸俗的味道甚浓。后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一个过程，可以被清楚地认识为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化相联系。毕竟，奥林匹克主义一直是类宗教的社会运动，现代创始人希望将其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奥林匹克主义促进了殖民体系的建立。此外，后奥林匹克主义可以被理解成是建立在竞技比赛结果基础上的先验审美。

第三种解读奥林匹克主义的方式是奥运会被利用、解读、传诵和研究的方法。奥运会被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其中历史学占据主要位置，还包括记者、热心人士、宣传工作者和卫道士。然而随着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语言转向，探究奥运会如何被撰写和阐释的思路看起来过时了。实际上，我们将其作为整合此书内容的逻辑起点，并认识到我们的奥运会知识绝大部分取决于奥运会被如何探究和媒介化。事实上，约翰·麦克隆在 1992 年就质疑奥运会被阐释的方式，呼吁奥运会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然而，极少有人这样去认真书写奥运会。这种方法将世界上最大体育事件的竞赛和观赏的多重体验转换成为一种媒体消费的象征。

1. 书写奥运

本部分内容强调文本阐释的问题，第一章道格拉斯·布兹审视“奥运会”的书写方式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利用文学理论和修正史学家的言论，布兹在研究几种书写“奥运会”的风格后，解构了它们的使用方法。他通过强调“奥运会”书写方式的重要性，清醒地采取一种文本策略，拒绝将“Olympic Games (奥运会)”作为一个先验正确的名词。此外，布兹和塔茨（2000）对他们这种缺少“对大写字母”的尊重进行了颠覆性的解释：

“古代奥运会在奥林匹亚举行，因此用大写字母‘O’表示特定地名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现代语境中，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和古代奥运会、古奥林匹亚没有任何关系，必须用小写的‘o’。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当人们讨论奥林匹克主义哲学时，用小写的‘o’，这种做法给人的感觉是奥林匹克主义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等一样，不必要单独使用大写字母来表示。”（布兹与塔茨，2000）

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出首字母大写的奥林匹克主

义有一种否认其作为意识形态地位，反而促使自己变得实体化、本质化和固化的趋势。然而如前所述：“奥林匹克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解释，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修正，也在不同的空间中赋予不同的意义”（汤林森与沃内尔，1984）。当然，我们并不确定所有的作者都采取布兹式的文本策略，他对传统的、大写的奥林匹克单词的干预只是证明了重新阐释奥运会时可能存在的困难。我们必须将对奥运会的理解建立在自己可以掌控的知识范围和语境当中。布兹对奥运会小写化的方式不是玩文字游戏，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奥运会而已。因此，对传统书写方式的思考超越是描述后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一步。

昂德·克鲁吉尔在质疑 1936 年奥运会官方史时采用了布兹的历史观。他在第二章中认为，柏林奥运会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一种后现代情境（或许几种情境），这样的观念在后面的章节中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与后奥林匹克主义的融合（见达玛加尔撰写的第十四章）。克鲁吉尔强调奥运会绝不是铁幕一块，相反，自从 1936 年开始，对奥运会的书写在一定意义上意见变得后现代化了，甚至难以记录和反映奥运会的本质。同时，“纳粹奥运会”以及后来的奥运会都被阐释成为奥运会的模拟物了，他们就像鲍德里亚所认识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似乎并没有真正发生过。显然，假象、粉饰和艺术化变得如此重要（见莫勒尔、达玛加尔和沃姆斯雷撰写的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的只是奥运会忽隐忽现的影像。其他章节也采用类似的书写风格，布朗在第六章里展示了他印象派式的和拼接画式的风格，汤林森在第九章里展示了他与悉尼奥运会经验主义式的相遇（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而辛德尔在第十章里展示了她的“思想体操”。

此外，在书写奥运会时，尽管有莱因哈特·如鲁普（1996）对 1936 年奥运会史料的成功编撰的案例，但我们极少读到来自传统意义上奥林匹克核心参与国之外的个人和群体的声音。苏珊·布朗内尔、亨宁·埃克伯格和本·卡林顿在第三章至第五章里分别发出了来自如中国奥林匹克先驱、土著澳大利亚运动员和赤道非洲国家的沉默群体的声音。另外，布朗在第六章里表达了使用举办过奥运会场地设施的普通运动者的想法。这些书中的章节在一定意义上是后奥林匹克式的，它们倾向于跳出传统奥林匹克研究的窠臼。

2. 一种全球通用语言

奥运会被认为是少有的能够将世界上的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文化样式之一。规制的普世性与体育的记录性特点使得奥运会变成追求卓越的全球性文化现象。然而，与此同时，奥运会却变得分裂化、种族化、精英化、排斥同性恋化与男权化。此外，奥运会一方面被认为是城市与区域再造的重要推动力，另一

方面却被看作加速环境恶化的幕后推手。从 1896 年第 1 届伊始，奥运会就面临许多问题，对奥运会的批评也从未间断。顾拜旦自己也被 1904 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的“人类学日”所激怒，在“人类学日”期间，土著人被安排参加跑步、跳远和投掷等奥运会比赛项目，新闻报道中直呼这些人为“野蛮人”（格科索亚，1990）。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认为人类学日主办方的目的是希望土著选手超过参加同类项目的奥运选手。然而，令主办方失望的是，阿伊努人、巴塔哥尼亚人、土著美国人以及土耳其人的赛场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奥运选手。这并不奇怪，毕竟他们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身体文化实践，然而奥运会却成为了种族主义势力抬头的舞台。

种族主义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被反复展示。昂德·克鲁吉尔在第二章有关柏林奥运会的研究中见证了德国人试图将犹太人从国家队驱除出去的行径（古特曼，1992）。在纳粹分子眼中，犹太人不适合从事体育、难有赛场表现、与奥运选手的竞技精神格格不入，犹太人懦弱且缺少“足够的赛场竞争的勇气”（里高尔，1981，第 96 页）。此外，希特勒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方式来驱赶犹太人，那么接下来奥运会上被排除的下一个群体一定是黑人选手。由于进化的原因，黑人选手被认为拥有天生的身体优越性，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纳粹奥运会后，奥运会得以幸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柏林将奥运会加以规范化。在瑞芬斯塔耳制作的官方电影《奥林匹亚》中，希特勒和柏林被分别认为是礼貌的体育迷和整洁安全的城市。而且，如克鲁吉尔所指出的那样，那些聚集在一起欣赏奥运会的人们和去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者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奥林匹克的论述中，种族主义者的阴魂始终不散。一直到 1944 年，一位参与撰写瑞典百科全书的作者还指出，黑人选手参赛绝不可能树立奥运会参赛选手的标杆（格科索亚，1990）。然而在十年之后，厄内斯特·约克和他的芬兰同事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在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非洲运动员获得的巨大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受到刺激的大众媒体却在自己编织的奥运会叙事中继续讲述种族化的论调。在本书接下来的几章里，欧洲中心主义转而成为被大肆书写的主题。

在 1936 年奥运会期间，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主办国采取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反的人权政策。另一方面，如克鲁吉尔所言，不仅是美国，许多其他参赛国的选手和官员也都持有反黑人和反犹太人的态度。在 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被授予北京，苏珊·布朗内尔在第三章将此与克鲁吉尔的前期研究进行了对比。她不仅作为沉默群体的代表——何振梁的声音留足空间，也

在不断追问：中国将为奥林匹克主义做何改变？奥林匹克主义将为中国做何改变？接纳中国作为主办城市是否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柏林为翻版？

尽管“种族平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响亮无比，但种族主义却继续在奥运会上扮演重要角色。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选手总被赋予刻板印象。在亨宁·埃克伯格撰写的第四章里探讨了种族性与身份认同的叠加效应。他在寻找能够为被动参赛运动员提供认同的际遇或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回到顾拜旦的“体育地理”中寻找答案。然而，在后殖民情境中，民族国家愈发地变成泰勒笔下的“泄露的容器”，基于此，我们很难说被派遣的奥运选手仅代表他名义上的所属国家。一个绝佳的例子是来自肯尼亚的 800 米运动员威尔森·基普凯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如南非裔英国长跑运动员佐拉·巴德、美国裔多米尼加 400 米栏运动员费列克斯·桑切斯等。这些运动员至少同时拥有来自母国和代表国的双重认同，但他们或许还拥有来自教练、居住地、跑鞋赞助商的认同。在这样的情境下，作为体育赛事的奥运会的“国际”性将变得毫无意义，约翰·霍伯曼在第十一章里提到的全球竞争的“去国家化”就很好地注解了这一点。此外，埃克伯格梳理了不同层次的认同，如部族与民族、土著澳大利亚人与被领养的丹麦人。

顾拜旦倾向于在奥运会中使用“民族”而非“民族国家”的表述，他将奥运会看作是依据于“体育地理”，而非“政治地理”的。也就是说，他感觉奥运会的概念范畴是要大过政治的。尽管这种想法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幻想，但许多场合却证明了是民族而非国家在奥运赛场上竞争，如芬兰在 1912 年奥运会入场式中刻意同俄国（译者注：当时俄国占领芬兰，芬兰作为非独立国参赛）保持很远的距离。因此奥运会的认同往往被描述成是体育的而非国家的。埃克伯格附和了顾拜旦的观点，并预计未来的奥运会上会出现魁北克代表团、威尔士代表团或布列塔尼代表团，当然，甚至是阿迪达斯代表队对抗耐克代表队或一个制药公司队对抗另外一个制药公司队（要重新提及霍伯曼在第十一章里用到的体育民族主义）。

本·卡林顿在第五章里更加明确地探讨了种族的历史向度以及悉尼奥运会的种族特征。他将奥运会看作全球文化空间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超国家认同（世界主义）的模式在理论上已经变得可能。因此，世界主义被看作是 21 世纪流动的国际体育劳工的重要特征，当然如前所述，这样的特征往往局限于少数精英运动员群体中。然而，卡林顿试图证明，像这样出现在奥运会公共空间中的新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可能是伪装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膨胀将导致世界主义式的愿景落空。他为低估民族主义的奥运会做辩护——在奥运会上，

失败往往归因于个人能力问题,而种族成见也往往消失于这个把世界主义当作伦理规范的舞台。

在 20 世纪,对奥运会的批评与异议显得司空见惯。一方面,顾拜旦本人强烈质疑 1904 年圣路易斯主办奥运会的合法性,他甚至批评 1908 年伦敦奥运会的规划安排,认为白城体育场毫无生气、阴沉昏暗。另一方面,在巴黎布隆涅公园举办的第 2 届奥运会却被顾拜旦看作是绿树成荫、喜悦动人(顾拜旦,2000)。1936 年柏林奥运会遭到铺天盖地的反对。当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因为阿拉伯恐怖分子对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的恐怖袭击而遭遇提前终止的危机时,人们的争论也持续不断。1975 年,英国小说家阿兰·西里托注意到:

“如此不恰当地匆忙重新开始这所谓的奥运会恰好体现了它的真意所在——主办国不愿意眼看巨额投资付之东海,而且运动员不愿意以牺牲大众情感为代价放弃辛苦积累的体力付出。”(西里托,1975,第 88 页)

在这里,西里托提及到了奥运会与运动员优先的基本伦理问题。这样的伦理批判反映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奥林匹克思考中,如简·玛丽·布罗姆在 1978 年的研究。伦斯基在第八章、莫勒尔在第十三章中回顾了奥运会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危机。

3. 后奥运

奥运会会留下许多遗产,其中一些遗产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而其他一些则草草消失。此外,按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奥运会将导致积极和消极两种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城市、地区从奥运会举办中获得的好处是高速公路、体育场馆、标志性建筑等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而这样的大型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居住混乱与赛后长久持续的高税收支出等。大量研究涉及到了此类主题(伦斯基,2002;洛奇,2000)。

道格拉斯·布朗在第六章特别关注了 1988 年卡尔扎里冬奥会赛后的场地设施利用情况,特别是速滑馆的利用情况。他忠实地记录下自己在这座场馆里滑冰的感受以及滑冰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显然,他把研究场馆的学者与滑冰爱好者的身份合二为一了。布朗在研究中把方法论、描述、解释与理论模型充分融合在一起。这座速滑馆不仅简单地被视为奥运场馆,而且是一个后奥林匹克体验馆、一个资源共享的场所、更是一个容纳了速滑明星与普通滑冰爱好者身份冲突与交融的场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场馆的严格控制与管理已经取代了他曾经认为的自由开放,这座后奥运的场馆变得与前奥运时期的奥运选手专用特性更加一致了。

未来奥运会不断受到挑战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在第七

章里，理查德·凯士曼把目光聚焦到其他与奥运会发生利益竞争的单个或综合赛事上。他同样指出，新赛事的茁壮成长伴随着对体育比赛“去欧洲中心主义”的诉求。与其他几个作者一样，理查德注意到了，随着全球化体育系统的变革，奥运会的欧洲中心主义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新的走向，比如，奥运会将用源于亚洲的体育项目取代固有的欧洲式项目，这些项目将取代像赛艇、赛马这样的高人力资本投入项目、像撑竿跳高这样的田赛项目、像绝大多数国家难以开展的冬季项目。这种理念上的变化就是罗兰在第十二章里提到的“追求更加广泛的参与度”。

海伦·伦斯基在第八章里描述了另外一种未来的奥运场景。对于大多数的奥林匹克历史而言，那些被迫参加而非自由选择参加的经历者的声音很大程度被过滤掉了。然而，如伦斯基所展示的那样，对奥运会不同层面的反对声音中，有一些声音相当成功地发出了。伦斯基列举了大量对奥运会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不仅包括“邻避主义”者（周围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还包括反全球化的势力。他注意到这些反对奥运会的声音在国内媒体的层面上被淡化了。但是，奥运会可以被看作是后奥林匹克主义与反全球化不期而遇的场所，反全球化的趋势与反奥运的浪潮一样，都不能瞬间消失。在将来，奥运会一方面将展示民族体育用品品牌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展示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的产品，还伴随着激烈的抵制、示威游行、骚乱与对峙。与伦斯基的章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兰·汤林森撰写的第九章。在许多方面，他都采取更加积极的思想观念来看待悉尼奥运会，认为悉尼的奥运主题公园和文化表演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个体育迷、旅行家和社会学家，他将以更加恳切的目光关注到现代奥运会的标准化、美国化以及参与或观赏现代奥运会所带来的个体欢乐与家庭融洽上。他甚至预言未来的奥运会将充满幻想与欢乐，这似乎与辛德尔在第十章的观点不谋而合。

4. 更快、更高、更强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顾拜旦不断尝试把“更快、更高、更强”当作奥运格言（杨，1996，第 108 页）。从那开始，速度变成了第一位的要素。在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快速尤其被看重，相反慢速则被轻视。那些以迟缓而引人注目的选手如英国的跳台跳雪运动员“飞鹰”埃迪·爱德华兹与赤道几内亚的游泳选手“鳗鱼”艾瑞克·穆萨姆巴尼以其滑稽的形象带给大众媒体不一样的感受，但大众媒体对此类运动员的关注却只是极少数情况。打破世界纪录才是奥运会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个缺乏速度与对抗的比赛往往被认为是表现不佳，不值得出现在奥运级别的赛场上。速度被看作现代体育的本质，世界纪录不断被提升，大量的奥运会选手的成绩被不断超越。究其各种原因，技术的进步毫无疑

问起到重要作用，曾经的煤渣跑道被人工合成的塑胶跑道所代替，河流被游泳池所取代（贝尔，1985）；从苯丙胺到类固醇，天然的运动员变成了半机械化的电子人（科尔，1998），奥运纪录岂能不被一破再破。

速度的概念在辛西娅·辛德尔的第十章里是个关键词，她通过速度来推测奥运会未来可能的不断超越化、审美化和电子化。就像顶尖的奥运选手需要不断加速，奥运会对时空的传递也在不断加速。辛德尔阐述了当前整个社会的加速度化，而这正是“时空压缩”所导致的后果（哈维，1989）。辛德尔指出，“速度、时空、加速”变成了后现代体育的本体论特点。然而，她也注意到了未来的奥林匹克主义图景中审美与体育的联系不断在加强，这种联系在莫勒尔与黛穆娅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中均有涉及。辛德尔还将仿真式的隐喻置放到超现实的世界中来看待青年人对电子竞技突如其来的热衷，在电子竞技中，传统的奥林匹克活动比如艺术、雕塑等重新以电子化的形式复活了，在虚拟世界中，运动员、学者、路人与影像制作者彼此矛盾重重，却又相安无事。

可以肯定的是，奥运会是一个速度的竞技场。统计数据表明，1896 年奥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成绩为 12 秒整，而到了悉尼奥运会上，这一成绩被提高到 9 秒 87，几乎提前了 20 米。在全球范围内，体育纪录不断被书写，空间不断被时间所压缩，另一方面，现代奥运会的速度的平衡在各大洲运动员之间流转。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日本选手曾经称霸泳坛，时至今日，泳池却成为了澳洲选手与美国选手的天下。在跑步项目上，芬兰运动员一度在二战前统治中长跑距离项目，如今，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选手夺金牌如探囊取物。实际上，在英国等国家，奥运会选手成绩的提高却在逐步放慢，未来的奥运会上，不可能再出现与塞巴斯蒂安·科、史蒂夫·奥维特以及史蒂夫·克拉姆这样选手匹敌的人物了。许多国家最好的奥运纪录也将放慢被一一超越的步伐。

西格蒙德·罗兰在第十二章里阐述了“慢速”这一现象。如果说辛德尔将高科技与新的年龄歧视相提并论，罗兰则鼓励大家重新认识强调可持续发展、减少专业化、去除脆弱本性的体育世界。他指出高度专业化的体育项目，如百米竞赛拥有更多的审美价值，但身体文化活动要求身体素质更加全面的发展，从而摆脱各种形式的专业化伤害。他因此提倡通过更加多元化、复合化的体育活动来减少极端专业化对高水平运动员带来的种种伤害。

5. 后奥林匹克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尽管“绿色”的字样常常与奥运会为伴，但它仍被一些人视为会对环境带来污染。当然，在一些充满感性的描述中，运动员的身体也有可能对田径场、游泳池、举重场地和自行车场带来污染。此外，奥运会也逐渐成为服用兴奋剂